

---

#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陆远权<sup>1</sup>

(重庆三峡学院宣传部, 重庆万州 404000)

**【摘要】:** 重庆开埠加快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通商贸易产生的商业力量打破了城市的内闭式结构, 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功能, 引发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新变化, 城市建设也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平台。重庆因商而兴, 外贸成为城市变迁的重要支撑。工业滞后则在一定程度上掣肘着城市的近代发展。

**【关键词】:** 重庆; 开埠通商; 城市; 近代化; 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 (2004) 04-0023-06

近代以来, 重庆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 即重庆开埠、陪都抗战和重庆直辖。重庆开埠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在封闭型的城市体系上戳开了一个洞口,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由此而缓缓起步。

## 一、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启动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两大主题: 一是城市化运动, 二是城市的近代化运动。前者突出城市在量方面的发展, 后者则反映城市在质方面的变迁。重庆的开埠通商不仅加速了重庆的商业化进程, 使城市的经济运作被置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影响之中, 而且还对城市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启动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首先, 开埠后通商贸易的发展积淀了大量财富, 形成有助于重庆城市近代化的经济动力, 加速了城市发展的步伐。通商贸易活动的开展, 经过商人、经纪人、买办之手, 财富和金钱在流通的过程中, 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 把大量社会财富从乡村集中到城市。尽管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强所攫夺, 但留下的“门坎钱”也渐渐形成了数量不少的财富积淀。

其次, 通商贸易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趋向,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 在传统的生存农业逐渐向近代混合农业转变过程中, 农村中的“人口推力”逐渐增大。通商贸易的不断发展, 增强了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鼓励着众多农民扩大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大促进了部分地区农业的专业化、区域化和商品化趋势, 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食品 and 工业原料等物质条件。

再次, 通商贸易的发展动摇了“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 在近代重商思潮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谋生的希望由土地转向市场, 由乡村转向城市。重庆开埠后, 西方殖民者不仅把大宗的商品带到重庆, 而且把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和谋生手段带到重庆。

传统的“抑商”观念逐渐为重商意识所取代, 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受到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冲击。随着通商贸易的不断发展, 重庆不仅成了各类商品的集散地, 也成了近代重商思潮的大本营和传播中心。一部分农民开始由土地转向市场, 从乡

---

<sup>1</sup>收稿日期: 2004-04-25

作者简介: 陆远权 (1966-), 男, 重庆云阳人, 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 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

---

村转向市场所在地——城市，人口的城市聚集使得城市的规模逐步增大。

通商贸易带来的社会商业化趋势，尽管发展比较缓慢，而且很不平衡，但它确实成为城市近代化进程的一种主要启动力量，促使重庆出现在近代中国第一批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靠商业力量发展的城市之中。

曾有学者在探讨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济原因时，强调贸易与城市之间的一种逻辑发展关系。认为“广泛的贸易关系是城市近代化的前提，而城市近代化又反过来使贸易关系得到发展，使潜在的贸易关系成为城市近代发展的‘脱氧核糖核酸’”，“贸易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可以说，重庆在短短几十年中一跃成为近代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中心，开埠通商和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商业力量，是重庆城市近代进程的推动器，是重庆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特征。

## 二、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近代化发展

开埠以前，重庆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地区性行政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开埠以后，重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近代口岸城市。城市的近代发展虽受多方因素制约，但开埠通商对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影响巨大。

### 1. 开埠通商是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契机

近代重庆城市与近代中国多数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一样，都是由于城市功能和城市内部结构受到外力的推动而逐步演变发展的。其直接动力来自外力的推动；其发展轨迹归为刺激——反应这一模式。开埠通商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发展的契机。

开埠以前的重庆，是一个长期沉睡在中世纪状态的内陆型沿江港口城市，没有近代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及近代社会心理和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商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以内贸为主，市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通过 1890 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英国取得了在重庆的开埠特权。特别是重庆海关设立以后，法、美、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获准在重庆自由通商贸易，重庆市场也就这样向整个西方世界开放了。

西方列强把重庆开辟成通商口岸，一在于重庆的位置，二在于重庆的贸易基础。最终通过重庆的辐射力向四川、云贵等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以便榨取高额的垄断利润。然而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具有两面性。当西方列强在重庆垄断外贸市场，对城乡进行掠夺和破坏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重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加快了重庆向近代城市转化的步伐。

世界各国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动引起城市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城市性质的变化和城市的发展，其变化程序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又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形成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循环式发展。演变过程属于渐变型，演变的时间较长。

欧美的一般城市多属此种类型。另一种模式是由于城市外部力量的作用，使城市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的发展，这种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一般不是从工业化开始，而是从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业化开始，由于外力影响的结果，其演变过程表现为突变型。

近代中国因开埠通商而兴起的沿江沿海城市都属于这种发展模式，重庆当属其中。

开埠通商打破了重庆城市传统的内闭式结构，使重庆城市全方位地向近代化方向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内贸经济影响减弱，对外贸易开始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封建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新的商品制度逐步确立，一些新式商业公司和近代工厂陆续出现。

---

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新式商人和近代知识分子，雇佣工人也随着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增多。传统的商贸及社会组织逐渐淡出江湖，新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较大变化，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开埠的重庆显露出一个崭新的近代发展趋势。

## 2.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的经济近代化

城市的近代化，从根本上讲，首先要有经济的近代化。重庆在开埠以前虽然经济有所发展，特别是商业贸易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与沿海的通商城市相比，不论经济总量还是经济体系都离近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甚至在四川的经济地位远不及成都。重庆的市场处于半封闭状态，没有与世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重庆开埠后因市场的直接对外开放，商品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数值猛增，从1890年的685万多海关两上升到1910年的3230多万海关两，增幅近达5倍。进出口贸易成为重庆城市的一个主要功能，在城市经济结构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曾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sup>[1]</sup>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的发展，为重庆城市的近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因商而兴的重庆带动了周边的城市和地区，成为长江上游城市群体的流通中心。其商业聚集、辐射、中介作用的不断扩大，不仅使重庆朝着近代化的趋势发展，也为城市的近代化支撑提供了广阔的腹地。重庆的周边农村地区因进口商品的倾销，自然经济开始不同程度地解体，在为重庆城乡商品经济发展提供市场的同时，也为重庆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那样，“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乡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的可能。”<sup>[2]</sup>所以，如果没有开埠通商，没有外来商品的倾销，重庆周边地区的自然经济没有受到冲击，商品经济没有得到一定的发展，重庆城市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埠通商对重庆城市近代化“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3]</sup>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重庆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天然伴侣，作为商品流通中心城市必然要成为货币流通中心城市。货币流通是否顺畅，服务是否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商贸和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重庆开埠以前，执行货币流通职能的金融机构只有传统的票号，票号主要汇兑货币，很少兼备储蓄功能。

重庆开埠后，随着商业发展的需要，具有近代金融色彩的钱庄和银行逐渐兴起。钱庄开设的存放银钱、代办收交、汇兑和信用货币使用业务，对商人筹措资金、扩大规模、转变商品流通经营模式起着重要作用。银行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sup>[4]</sup>它起着动员闲散资金、集中信贷、组织结算、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作用。

随着1905年官办银行在重庆的建立，一些外省银行纷纷到重庆设立分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市场和分配中心，”<sup>[5]</sup>重庆作为区域金融货币流通中心的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

金融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庆的商品流动和资金周转，使重庆城市经济更加活跃。

在促进商业和金融发展的同时，重庆开埠引发了城市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要求。城市是人员和货物的集散地，交通运输是否畅达对于一个城市的兴衰至关重要。商品生产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都将伴随着商品实体在空间上的传输，采用较为先进的运输工具，开辟新的运输线路，是拓展市场、扩大流通的重要条件。

---

特别是近代工业兴起以后，能源、原料和产品运输量的空前增加，人口流动的急剧加大，对城市的运输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代重庆城市之所以能迅速崛起，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重庆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外部的交通联络以水上运输为主，因此发展川江航运直接关系到重庆城市的兴衰。在开埠前和开埠初期，重庆与省内外市场联系的水上交通工具只有民用木船，而民用木船的风险底线和载货量远远不能满足外来投资者开发重庆及四川市场的需要。

1909年，川江航运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川江行轮有限公司”开辟了从宜昌到重庆的固定航班，这以后各类机动轮船陆续往返于重庆与长江中下游之间，大大提高了船行速度和载货能力，为重庆近代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重庆航运业的发展，“意味着广大遥远的人口与西方制造商之间的自由而廉价的交通”，从而给重庆“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并且“贸易的扩展将立即随着轮船开往重庆而出现。”<sup>[6]</sup>

重庆开埠后商业、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为重庆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重庆开埠当年，商人邓云筮等在重庆集股成立森昌洋火公司，生产硫磺火柴，从而揭开了重庆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此后，一批商人、地主、官僚和外来投资者相继在重庆投资兴办企业，到1911年时，重庆有各类新式民族企业52家，外资工厂11家，洋行公司50多家，主要分布在火柴、丝纺、棉织、缫丝、造纸、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等行业。尽管重庆早期的近代企业规模不大，资本额较小，且多集中在轻纺行业，与繁荣的商贸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但要强调的是，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建立对重庆城市近代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它们多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老牌外资企业向内地重庆的延伸，有雄厚的资本和经济实力，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直接构成了重庆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内容，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重庆城市新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和水平。

外资企业在为重庆培育一批近代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同时，也为重庆训练了一批有经营近代化企业能力的新式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财富，对重庆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开放市场的逐步形成，重庆逐渐由单一的区域政治商业中心发展成长江上游的综合性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以近代商业、金融、交通、工业为支柱的经济体系。

### 3.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的社会近代化

通商贸易导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近代变迁。随着开埠后重庆商业、金融、交通和工业经济的新型发展，城市的社会阶层、组织变迁和文化观念也显现出近代化的趋势。新式商人脱颖而出，并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社会集团。他们除经济上的发展要求外，政治及社会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封建桎梏中剥离出来，积极倡导新知识、新文化，力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士绅阶层出现分化，经欧风美雨的淋浴，部分士绅逐渐成为对抗官府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式富农规模经营经济作物，刷新传统的经营理念和作业方式，成为农村社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社会阶层分化流动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更新发展，凸现新的价值取向。重庆总商会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城市新

---

式社团之一。它把单个的、分散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不断为新生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各种活动和斗争。移民组织开始脱离地域关系背景，由社会互助团体向工商同业行会转变。

哥老会等秘密社会组织逐渐认同和接纳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走向与革命团体的联合。一些政治团体和政党如公强会、同盟会等也纷纷现身重庆。旧有社会组织的调整，新的社团组织的出现，打破了业已形成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力量的平衡，使重庆出现大众参与社会的趋势。

物质世界变迁的同时，新思想、新文化在重庆得到了迅速传播。从1892年重庆拥有洋务学堂起，人们不仅了解到外国语知识，还涉及到不同于传统儒学的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天地。学校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培养近代新式人才的基地。1897年之后，报纸作为近代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重庆陆续出现。

《渝报》、《渝州新闻》、《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开智报》、《重庆商会报》、《救时报》等报刊布控成一个强大的信息传输系统。图书经销市场亮相城市社区，书店成为人们摄取精神食粮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代大众媒介的兴起，使新思想、新文化及各种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导致了社会时尚和社会风气的趋新，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开放性的趋向。重庆由此跳出了封闭格局，呈现出一片开放进取态势。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和观念一下子在重庆纷纷涌现，一统天下的封建思想被打破，近代意识异军突起，尤其是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思想变化最大。

新式商人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日益形成，较为普遍地接受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商战”，扩大市场来“力挽利权，”<sup>[7]</sup>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民主思想和天赋人权观，他们通过中西制度的比较和对照，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要求变法维新，进而提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

重庆之所以成为四川维新运动的策源地和四川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与重庆开埠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开埠后重庆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和信息渠道的增多，重庆市民的思想渐趋自由、开放，信息渐趋灵通，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市场份额占有率渐趋增大。在消费领域，人们开始对洋纱洋布“偏爱”，对煤油的使用日益推广，“没有人因为怕火而反对使用煤油”，洋伞逐渐取代过去流行的草帽，人们对火柴、闹钟蜡烛、铁皮保险箱以及更多的生活日用消费品越来越表示出强烈的兴趣。<sup>[8]</sup>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文素质的相应要求，重庆市民相对周边民众有更加强烈的受教育欲望，这也成为观念更新的一种体现。

#### 4.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建设的近代化

开埠的重庆，在西方殖民者的眼中是一块充满利益诱惑的冒险乐土。大批外国人抢岸登陆，陆续修建领事馆、洋行、公司、工厂、学校和教堂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和建筑物的修建对重庆城市的规模扩张、地域结构和内涵建设影响很大。特别是租界和租借地的出现，不仅使重庆城市地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也使重庆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重庆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管理、治安管理等起了示范作用。

1901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了租界，占地面积达四十六万多平方米。从1902年起，先后有日商有邻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日本军舰集会所、日清公司设立其间。<sup>[9]</sup>另应在渝各列强请求，通远门片区被划为外国使馆区。紧邻馆区的打枪坝高地，被重庆海关租用为重庆海关税务司公所。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在长江、嘉陵江沿岸修建了八个商业码头和货栈，城市空间也突破了原来的城墙范围，从朝天门到南纪门，沿南城一带形成了一个长达七里的新兴商业城区。店铺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陕西街一带富家大商较多，道口、悬庙街、白象街、新丰街、三牌坊、鱼市口、商业场等处是非常繁华殷富的街道。”<sup>[10]</sup>商贸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城市聚集，

---

商业性移民的增加，致使开埠后短短 20 年时间，重庆城市人口增加近一倍，达到三十多万。其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占有相当比例，在部分城区甚至占到一半以上，城市的经济功能相当突出，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

### 三、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特征

#### 1. 重庆城市近代化发展以商业外贸为起点

一个城市的近代化，必先表现为经济的近代化。近代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经历了“商业—金融—交通—工业”的发展过程，即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是从商业外贸起步的。商业中心的形成，是重庆开埠以后城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支撑。正是它改变了重庆城市的经济面貌，把一座古老的传统城市引上了近代化之路。

虽然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它的被动性，受制于出口贸易和国际市场以及商业活动本身的诸多不规范性等因素，但商业中心的形成开始改变了城市功能和城市性质，城市的主要功能开始由军政中心让位于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得到迅速提升。也正因为近代重庆经济中，发展最早、发展程度最高、规模最大、作用最大的当属商业，因而商业中心作为城市经济功能中的主导功能，决定了重庆作为商业城市的性质。

在这里须说明的是，根据城市学观点去考察具体地区的城市化的起始时期——经济中心的形成时，大多城市特别是近代西方城市多从工业中心开始，逐渐形成商业、金融、交通中心，从而构成经济中心。从商业中心开始然后形成工业等其他中心的城市近代化道路，以近代中国特别是依托江河湖海的口岸城市居多。在近代中国，依靠优越的水运条件，由商业起步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如上海、武汉、天津、重庆等，这既是中国近代城市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又是重庆近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西方城市经济学家罗兹·墨菲认为，“就现代商业、金融、工业都市的最后成熟阶段而论，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匙。”<sup>[11]</sup>不同的是，在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外资而是华资，重庆商业主要掌握在华商手中。

#### 2. 重庆城市近代化发展相对缓慢

重庆深居内陆，对外开埠时间与沿海城市相比，晚了近半个世纪。时间上的悬殊，意味着发展机遇的丧失，近代化进程的落后。特别是对处于同一特定环境和发展平台上的城市，开埠时间的早晚、外力刺激的强弱，可以说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起步较晚，除近代商业外贸、金融与航运发展较快外，作为近代化主要标志的工矿业，若与上海或其他城市作一比较分析，就可看出在重庆开埠后的 20 年时间内发展缓慢的程度。

上海 1891 年有近代纱厂 7 家，发展到 1911 年时，达到 48 家，拥有 1 万 3 千多部丝车。而重庆的机器缫丝业是重点行业，最早出现于 1902 年，发展到 1911 年也不过 4 家。更何况设施设备简陋，机械化程度不高，在工业产值上，与开埠较晚的武汉相比，重庆也仅及七分之一。

重庆近代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处边远、交通落后是客观因素，但流通体制、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及观念等也是造成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第一，重庆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发展很快，但多系转口贸易，利润价值不高。重庆进出的大宗商品须经宜昌、武汉和上海等地转运，商品价格牢牢控制在转口口岸的洋行买办和大商手中。他们对入川进口商品实行垄断高价，压低出川土货商品价格，从而造成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剪刀差。以进口棉纱为例，1892—1906 年价格上涨了 24%，而出口生丝价格则下降了 13%。<sup>[12]</sup>转口贸易不仅增多了流通环节，增大了运输和商品成本，而且商业利润也大多流入转口口岸的洋商和当地商人手中，真正的渝商不过是从利润总额中得到一点余利，这严重影响着重庆城市发展所需资金的积累和投入。第二，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没有技术含量，利润价值薄弱。重庆开埠虽然使重庆经济开始摆脱过去地域封闭型经济，外部关系呈开放状态，

---

市场广阔，工业品需求增加，但重庆的对外出口商品相当部分来自四川和其他省份，这就决定了重庆只能是一个商品集散地、中转站，而不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而且重庆出口到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大多为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如生丝、猪鬃、羊皮、烟叶、药材等，这些山货土产没有深细加工，技术含量不高，所赚利润薄弱。加之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制约，利润也极不稳定。不合理的贸易商品结构，使得重庆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工业发展滞后，资金注入率低。

重庆是一个传统商业城市，虽然有一定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但长期的封闭状态，导致小农经济环境对工业生产和工业品消费没有需求。因此重庆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基础条件特差。重庆的近代工业发展是在开埠以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重庆的近代工业发展缓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就是发展到 1933 年，其工业产值和资本额也仅在全国数第 9 位。<sup>[13]</sup>特别要提到的是，在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因地租率很高，商业积累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不愿投入到风险较高的新兴工业行业，转而逆向流入乡村，这成为重庆工业资金短缺、工业规模不大、设备落后的重要根源。

因此，商业资本和社会资金的流向对重庆城市近代化产生着一种抑制作用。在西方，通商贸易的发展，不断造成大量财富和资金持续流向工业部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信贷基金，从而顺畅地通过工业起飞的“瓶颈”，解决城市近代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刺激下的工业发展是近代城市发展的“供血库”和“蓄水池”。在重庆，工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贫血状态之中，工业资金严重不足，社会资金向工业的转移零星而迟缓。开埠通商所造成的商业资本膨胀，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通商对重庆工业起飞所起的“孵化”、“输血”作用是很有有限的。

近代重庆所在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从土地中榨出的财富基本上是一分为三：一部分滞留在农村，成为地主和农民的消费资金和实物，地主们常常以其所得去继续购买土地，扩充家产；另一部分作为赋税被政府抽走，为统治阶级所享用；还有一部分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业资本。在农村财富的三种流向中，被转化为商业资本的那一部分财富又被一分为三：或被外国洋行所控制，进了外国人的腰包；或在城市流通领域中积淀了下来，继续在转手倒卖中以钱挣钱；或再度返回农村，或从事风险不大、利润较高的土地购置；或赡养仍在农村的妻室儿女和老人。

可见，通商贸易虽然使重庆集中了相当一部分资金财富，但真正转化为工业投资的却不多，绝大部分仍滞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工业投资不仅资金需要量大，而且风险很大，利润极不稳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风险最小化的商品经济观念支配下，自然很多人不会去进行工业投资。工业资金的不足必然导致工业的低度发展，而工业的长期低度发展，必然会使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量有限，无力把大量农村人口“拉”入到城市中来，城市的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就受到限制。加之重庆的金融企业又主要是为商业提供服务，对工业扶持极少，更何况外国工业品的市场充斥，也压抑着重庆新兴工业的成长壮大，重庆近代工业发展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由此可以想象。一般说来，工业化与近代化互为一体，重庆的工业现状严重影响着近代化的进程。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71.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8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09.

[5] 周勇等译.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24. [6] 聂宝璋.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辑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97-399.

---

[7]广益丛报[R]5-4,“纪闻”。

[8]一个世纪的历程——重庆开埠 100 周年[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

[9] 民国. 巴县志[M]. 卷十六, 重庆: 重庆图书馆藏 26-27.

[10]日本东亚同文学. 四川新地志[M]. 昭和十六, 105.

[11]罗兹·墨菲. 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2-3.

[12]周勇.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392.

[13]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106.